

“出走”的王宝川：熊式一话剧《王宝川》的伦理协商与跨文化对话

Lady Precious Stream's "Breaking Away": Ethical Negotiation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in Hsiung Shih-I's Play *Lady Precious Stream*

刘茂生 (Liu Maosheng) 罗俊敏 (Luo Junmin)

内容摘要：熊式一话剧《王宝川》在国际舞台获得广泛认可，亦陷入了自我东方化的舆论争议之中。为清晰传递中国文化立场，熊式一在剧作中设定王宝川直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价值矛盾，致力于突破“中国的玩偶之家”所蕴含的认知困境。王宝川出走这一核心伦理选择，推动她的伦理身份从父权伦理体系下的从属者向具备协商意识的主体转型。该转型过程呈现出鲜明的流动性与开放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动态的“第三空间”。这一空间承载着多元文化意识，通过持续的伦理协商达成价值共识，进而向世界呈现“中国的真实情形”。王宝川的出走叙事，不仅彰显了伦理协商与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更为中国戏剧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关键词：王宝川；熊式一；伦理协商；跨文化对话

作者简介：刘茂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 /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叙事学；罗俊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 2025 年度招标课题“中外文学文论交流互动研究”【项目批号：25ZBKT0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Lady Precious Stream's "Breaking Away": Ethical Negotiation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in Hsiung Shih-I's Play *Lady Precious Stream*

Abstract: While Hsiung Shih-I's play *Lady Precious Stream* has achieved wid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t has also been drawn into public debates over self-Orientalization. To clearly articulate a Chinese cultural position, Hsiung Shih-I constructs Lady Precious Stream in the play as a figure confronting intersecting value conflicts: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and the East versus the West. Through this characterization, the play seeks to transcend the cognitive predicaments implied

by the notion of “China’s doll’s house.” The critical ethical choice of Lady Precious Stream’s breaking away has facilitated her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bordinate within the patriarchal ethical system to a subject capable of active negoti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marked by fluidity and openness, through which a dynamic “third space” is established. This space carries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rough sustained ethical negotiation, makes possible the formation of value consensus, thereby present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The narrative of Lady Precious Stream’s breaking awa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ethical negotiation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but also offer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Chinese drama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the context of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Keywords: Lady Precious Stream; Hsiung Shih-I; ethical negotiation;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uthors: Liu Maosheng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areas cover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Narratology (Email: liumaosheng2004@126.com). Luo Junmi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jmmm2015@163.com).

熊式一的剧作《王宝川》(*Lady Precious Stream*)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在世界舞台彰显了中国戏剧的价值。该剧自1934年于伦敦西区上演以来获得巨大成功,连演900余场。¹1935年剧作首次进入美国剧场,第一季度在纽约布思剧院(The Booth Theatre)成功创下超过200场次的演出佳绩。²

《王宝川》的热度不仅限于欧美主流国家,20世纪30年代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地上演。³该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接受,被《泰晤士报》(*The Times*)称为“载入史册”(Anon, “A Place in History” 5),可谓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该剧在大众传播领域大获成功,却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自问世以来,《王宝川》便面临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诘难。这一评价恰与阿里夫·德

1 参见 熊式一:《八十回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2 参见 Ashley Thorpe, “After Thought: Archiving Absence through a Practice-as-Research Production of Xiong Shiyi’s *Lady Precious Stream*,” *TDR: The Drama Review* 63 (2019): 83。

3 参见 熊式一:《八十回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

里克 (Arif Dirlik) 所界定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 (281) 相契合, 即东方人内化了西方社会的认知规训, 并以东方主义的话语视角对自身文化进行审视与建构。熊式一在剧中建构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幻想曲” (Anon, “Kingsway Theatre” 4), 被洪深批为未呈现“中国真实情形”, 反而刻意“迎合和补充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偏见” (洪深 252)。针对这一争议, 熊式一曾阐明创作初衷: “我把一出中国旧式京剧, 改成合乎现代舞台表演, 入情入理” (熊式一, 《八十回忆》 30)。近年来, 学界对该剧的研究无论是挖掘多元语境空间中的中国性内涵、梳理重塑东方的实践路径, 还是探究文化身份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逻辑¹, 均从文化的宏观视角回应了当年洪深的诘问, 鲜少关注熊式一选择王宝川作为主角的道德考量。熊式一改编《王宝川》, 正是要避免主角“奸情”和“谋杀亲夫” (熊式一, 《王宝川》 191) 等旧社会伦理失序行为在跨文化交流中可能导致的“辱国”问题, 是一次在协商中寻找伦理共识的戏剧跨文化实验。由此, 熊式一让王宝川走出中国的玩偶之家, 并借助伦理身份的转变在叙事两端发起伦理协商, 邀请多元文化意识进行超越时空的跨文化对话。

一、王宝川之困: 中国玩偶之家

《王宝川》改编的点睛之处, 莫过于熊式一独具匠心, 让主人公王宝川毅然出走。《泰晤士报》曾以“中国玩偶之家梦境” (Anon, “Open-Air Theatre” 2) 评价《王宝川》, 可谓一语中的。王宝川与《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 1879) 的娜拉 (Nora) 类似, 深陷双重伦理困境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然而, 王宝川选择走出禁锢她的中国玩偶之家, 成为了兼具流动性与开放性的伦理主体。她选择出走, 在故事世界开启了全新的时空场域。观众也受邀置身其中, 携手推动叙事进程。

王宝川是中国新旧思想激烈交锋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物, 承载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淬炼。新文化运动以来,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新时代精神深刻影响了戏剧的创作与实践, 旧道德与新道德的对立与冲突成为戏剧家们探讨与论争的核心议题。洪深在批判《王宝川》的文章中, 开篇直指熊式一的选本存在“称道与推崇旧的成就与传统生活”的问题 (245)。在洪深看来, “女子的柔顺”属于已然过时的“旧道德”范畴 (245)。毋庸置疑, 王宝川与王宝钏之间存在着精神与文本关联, 均深陷父权制下女性的生存困境。但核心问题在于, 改编后的王宝川是否必须承袭旧道德? 在二者所处的伦理语境中, 父权的压迫具象为以男性为中心的家——相府与寒窑。这两个

1 参见 倪婷婷: “多元语境下的中国性呈现——以熊式一的英语创作及其争议为考察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5 (2020): 96-104; 张婷婷、徐玮: “重塑东方: 熊式一‘文化抗战’的跨文化实践”, 《艺术百家》4 (2025): 55-63; 黄炜星: “古典赋技、文化挪用与身份探寻: 从熊式一的〈王宝川〉述说跨文化交流”, 《广西社会科学》12 (2021): 181-186。

极端的生存场域中，女性以柔顺的女儿、恭顺的妻子身份存在，不得已向不平等的家庭秩序妥协。20世纪30年代，女性意识逐步觉醒，面对持续的压迫，王宝钏的顺势妥协已不再是被压迫女性的唯一出路。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于19世纪末创作《玩偶之家》，以主人公娜拉为女性提供重要的参照。娜拉曾是孝顺的女儿、恭顺的妻子，从依附父亲的家转向依附丈夫的家；直至伪造签名事件触及父权的核心利益，遭受双重苛责后，她才认清自身在家庭中的玩偶本质，最终选择出走。王宝钏身上无疑具备现代女性所追求的自由精神特质与自我觉醒意识，而她始终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在于：究竟该选择成为王宝钏，还是娜拉。

当王宝钏这一形象登上西方戏剧舞台，她承载的文化意涵被置入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语境之中。作为被东方主义话语持续审视的文化载体，她的个体生存困境扩大为交织着权力博弈与认知隔阂的民族文化困境。自17世纪以来，充满异域色彩的东方成为西方的文化热点。但该热点并未建立在对东方文化的深度认知之上，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仅限于模糊的想象与碎片化的传闻。在《王宝钏》上演之前，伦敦戏剧舞台从未呈现过原汁原味的中国戏剧创作。彼时，《黄马褂》（*The Yellow Jacket*, 1912）《灰阑记》（*The Circle of Chalk*, 1924）等中国风戏剧作品主导着西方戏剧市场。然而，这些剧作并非对中国戏剧文化的真实还原，而是西方创作者基于对东方的刻板印象与猎奇心理虚构的产物。20世纪初，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妖魔化态势加剧，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畸形的文化风尚。熊式一作为剧作家亦未能幸免，他的形象被西方媒体歪曲为杀人、抽鸦片的满大人。¹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东方的想象固化为一套不平等的权力秩序，无论是将东方浪漫化为诗意的乌托邦，还是丑化为愚昧落后的蛮荒之地，本质上都是西方依托自身文化霸权与文化优越感，对东方进行单向度建构与强制性赋义的集中表征。

王宝钏作为首位出现在西方主流戏剧舞台、表达中国传统戏剧精髓的核心形象，肩负着向世界阐释现代中国思想、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下不平等文化秩序的重要使命。然而，该使命的实现面临着多重现实桎梏。长期以来，西方观众深受东方主义话语体系浸染，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缺乏系统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亦被西方文化逻辑深度规训。如何引导西方观众理解王宝钏的生存困境、实现跨文化情感共鸣，成为戏剧改编实践中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若一味复刻中国传统戏剧的叙事范式，西方观众将难以领会王宝钏抉择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与情感逻辑，仅会将剧作视为猎奇的异域文化符号，无法触及人物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本质。反之，若生硬套用西方戏剧的叙事框架进行改编，王宝钏将彻底丧失独有的文化标识，沦为西方戏剧中“梅花女”（Moy

1 参见 Shih-I. Hsiung, "Never heard of a Mandarin," *Oxford Mail*, 17 June 1935: 5.

Fah Loy)¹ “常海棠” (Chang Hi-tang)² 式角色，最终消解中国文化身份的独特价值与象征意义。因此，熊式一为王宝川设置出走的叙事抉择，堪称契合时代语境的创造性艺术突破。当他致力于将旧式京剧改编为契合国际审美范式、遵循跨文化传播规律的现代舞台表演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王宝川塑造成兼具本土文化根性与现代性特质的中国文化形象？

熊式一对王宝川的角色塑造，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性的修辞性叙事，强调“某人在某些场合和目的下向另一个人讲述某事” (Phelan ix)，这意味着每一层叙事实践都内嵌着叙述者的立场与价值意图。戏剧的特殊之处在于“更为真实地展现剧作家的伦理诉求和道德关怀，是一种相对直观、易于理解且能即时引起观众共情的叙事类型” (刘茂生，《英国戏剧的伦理叙事研究》19)。熊式一的创作遵循这一逻辑，以王宝川的伦理选择³为叙事资源，与观众进行立场协商。正如傅修延所言，“叙事的主体是具有伦理立场的个体” (88)，熊式一讲述王宝川的出走叙事，必然承载特定的价值导向并推动相关价值观的传播。这种价值体系并非凭空生成，而是与叙事人物的伦理身份形成深度绑定，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⁴王宝川的行动穿梭于相府、寒窑与行宫，带来伦理身份的动态流变，形成独特的叙事线索，将不同时空的生命片段串联为一幅完整且立体的文化图景。她的每一次人生选择，均意味着以全新的伦理身份为立足点，重新审视并回应自身的生存困境，为观众提供了审视中国社会多元关系中权力结构的独特视角。王宝川两次出走引发的身份变化，为戏剧叙事注入了丰富的流动性特征，使《王宝川》得以突破单一的时空边界，邀请观众思考不平等权力结构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普遍性与延续性，商讨伦理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方式。熊式一通过王宝川出走的设计，以开放的叙事姿态在舞台和现实之间搭建混杂空间。观众受到王宝川的邀请，在新空间中进行价值判断，与作者开启超越时空的跨文化交流，进而抵达伦理共识。

王宝川的出走叙事，不仅是戏剧形式的革新，而且是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跨文化实践。剧作以修辞性叙事策略为核心路径，为王宝川这一角色赋予多层次的伦理意涵：通过伦理身份的动态流变与重构，塑造兼具真实性与文化辨识度的现代中国女性形象；以开放的叙事框架，构建了中西方文化平等

1 梅花女是1912年美国剧作《黄马褂》中的女主人公，与男主角武豪杰相爱并助他复仇。该剧用中国道德观念重释《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朝圣和救赎主题。

2 常海棠是1924年德国剧作《灰阑记》中的女主人公，被迫周旋于皇子和马员外之间，遭陷害被判斩首。皇子登基巧使灰阑记洗清其冤屈，海棠获释并宽恕仇人。该剧改编自中国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1929年经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英译后在伦敦上演。

3 参见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4 参见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对话的话语空间。王宝川的出走抉择，打通了文化壁垒的关键节点，为跨文化叙事格局注入了流动性与包容性。在某种意义上，王宝川的出走叙事超越了戏剧艺术的本体价值，成为承载中国现代性探索、诠释现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关键媒介。她的出走，既映照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实践探索难题与文化突围尝试，也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认知隔阂困境与跨文化融合可能。

二、走出相府和寒窑：从父权的从属到协商的主体

20 世纪 30 年代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中国戏剧，可分为中国传统戏曲与中国风戏剧两大谱系。中国传统戏曲以文化外交为核心传播路径，包括梅兰芳访美期间展演的《贵妃醉酒》、程砚秋留欧演绎的《荒山泪》等经典剧目。尽管戏曲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西方公众视野，它们始终是西方话语中承载了异域风情的艺术奇观。西方观众所接收的仅为中国“延续七百年未曾间断的文化传统”（Skinner 562），并未触及中国文化的内核。中国风戏剧的代表性作品则为《黄马褂》《灰阑记》。此类创作本质上是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选择性挪用，最终服务于“西方现代性”话语建构（Thorpe, *Performing China on the London Stage* 97）。不同于上述两种戏剧形态，《王宝川》既未复刻传统戏曲的叙事范式，强化西方对中国的刻板认知；也未盲从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沦为西方文化叙事的附属品。作为具备伦理主体性的叙述者，王宝川的出走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知识的双重反思与辩证整合，推进了从父权制下被动从属者向独立协商主体的身份跃迁。这一身份转变使王宝川跳出了以父权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不平等等级秩序，得以从中国现代性的视角来审视传统社会的结构肌理与权力运作逻辑。

在相府中，王宝川与父亲王允以“三击掌”的仪式完成了伦理上的决裂，实现了从父权话语体系下的客体，向自主掌控自身命运与主动伦理选择的伦理主体转变。而贯穿这一关键情节的宝衣意象，构成了区别王宝川与王宝钏的重要标记，清晰地揭示了二者在伦理选择、主体意识与精神内核上的不同，凸显了剧作的反传统叙事价值与文化批判意蕴。在《红鬃烈马》中，王宝钏所着宝衣是君臣伦理与父权权威的具象。该宝衣为皇帝以“君臣之义”为名义赐予王允的封赏（王瑶卿 127），王允继而以父女亲情为托词转赠王宝钏。王宝钏在王允的要求下被迫脱下宝衣，本质上未能脱离皇权与父权的双重规训。在“三击掌”关键节点，王宝川则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主体姿态：她挣脱了被动臣服于命运规训的叙事范式，直面生存困境提出自食其力方案，并以“好女不穿家里衣”¹（Hsiung, *Lady Precious Stream: Acting Edition* 31）为宣言，脱卸宝衣与珠宝。这一行为并非情绪化的冲动抉择，而是基于理性思

1 本文有关《王宝川》英文版引文均来自 Shih-I. Hsiung, *Lady Precious Stream: Acting Edition*, London: Methuen, 1936.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为笔者拙译。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辨的主体性行动，向观众表明她不仅摆脱了对家庭经济的结构性依附，更在精神维度上实现了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超越，成为挑战权威、自主掌控生命轨迹的现代女性先锋。

《王宝川》并未局限于对传统等级制度的批判，更延伸至对西方个体主义抗争的审慎省思。新文化运动时期，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潮在中国社会全面播撒，女性解放成为动摇封建等级秩序的核心议题。1918年，《新青年》刊发“易卜生专号”，把《玩偶之家》娜拉作为出走的文化符号，更加凸显其反抗性，将女性解放与社会现代性变革深度勾连。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尖锐批判了西方个体主义抗争模式的内在局限：单纯的个体意识觉醒，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¹ 剧作中，王宝川的母亲从现实生存困境切入发出诘问：“放弃珍馐佳肴，选择粗茶淡饭，你怎么过得下去呀？”（44）这一追问加深了王宝川对女性解放的思考：回归相府依附父亲，她将沦为父权进行利益交换的物化符号；依靠丈夫，她会陷入生存危机并面临被二次物化的风险；而坚守寒窑独立抗争，她自由的合法性与可能性又该如何保障？熊式一让薛平贵滞留西凉，为王宝川搭建了父权缺席的生存场域，在十八年的寒窑坚守中，完成了对“娜拉出走之后”这一时代命题的伦理实验。

王宝川十八年寒窑独守的岁月向观众揭示现实问题：孤立无援的个体抗争，难以构筑女性主体性独立的根基。熊式一在剧作的叙事节奏把控中尽显匠心，向观众阐明王宝川再次出走的必要性。他以整幕篇幅浓墨重彩地铺陈王宝川从相府奔赴寒窑的身体位移与心理嬗变，刻意强化了女性出走行为裹挟的决绝姿态与现实困境。与之形成对比，王宝川寒窑十八年的独立生存历程，被扁平压缩成一句“衣着褴褛”的叙述（67），以极具张力的方式呈现了女性孤立抗争的现实困境。十八年坚守未能为女性独立带来曙光，反而将王宝川推入更深重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当王宝川迈出寒窑的刹那，她完成了颠覆性的身份跃迁：从寒窑中坚守的边缘个体，转变为掌握独立话语权的协商主体。在王宝川与薛平贵的关系建构中，传统叙事里依附与被依附的等级结构被摒弃，转而形成权力对等的合作模式。二者共同主导复仇叙事的最终走向，重构全新的主体互动关系。

宝川：大王今早面圣的结果如何？

平贵：很好，皇上已把魏虎交给我处置。

宝川：太好了！大王打算怎么办呢？

平贵：还没办，我还想请你来决定。（91-92）

对话清晰呈现了多元协商的主体互动逻辑。在《红鬃烈马》中，王宝钏

1 参见 鲁迅：《鲁迅文集·杂文集》（上），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与薛平贵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特征。她实现诉求需要依赖自上而下的恩准，始终处于依附性的位置。而西方现代戏剧的叙事范式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往往呈现为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激进反抗，具有非此即彼的倾向。反观王宝川，她的选择超越了以上两种框架：既不向男性权威卑躬屈膝，也拒绝陷入对抗性的权力博弈；而是以平等的主体身份，与薛平贵展开理性的协商与共治。这种共商共办的互动模式，为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彰显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路径：摒弃极端化的二元对立，以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在权力的动态平衡中寻求问题的最优解，这正是中国传统伦理中“和而不同”的价值精髓。

王宝川的两次出走，串联起相府、寒窑、行宫三个空间，借身份的转换，为观众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动态视角。王宝川对主体独立前后的双重体验，直观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等级制度的普遍性。通过王宝川的出走，剧作完成对王宝钏与娜拉的创造性转译与重构：既批判了王宝钏丧失主体意志的盲目顺从，也解构了娜拉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假独立，以平等的伦理主体身份与薛平贵建立协商关系。她的出走向观众证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决裂，也不是对西方的全盘照搬，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对话中，进行的多元共生、协商共进的伦理实践。然而，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警示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21）。王宝川所倡导的平等协商理念，能否真正打动观众内心，打破固有的文化偏见与认知桎梏，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如何构建一种既契合西方观众审美习惯，又坚守中国文化内核的话语，实现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与有效沟通，是《王宝川》跨文化叙事实践的核心命题，也是当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关键课题。

三、走向世界：基于伦理共识的文化对话

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跨文化交流不断拓展。作为 20 世纪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之作，《王宝川》再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成为重新审查与阐释的重要对象。2011 年，艾什莉·索普（Ashley Thorpe）在伦敦舞台开展《王宝川》展演档案重建工作，系统还原了剧作在跨文化舞台演出过程中的文化协商机制，更深入揭示了剧作在历史语境变迁中所呈现的“反思性”特征（Thorpe, “After Thought” 85）。从这个意义上说，剧作在跨文化实践中完成了从静态文本符号到动态文化行动的范式转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出走。相较于逐字直译，熊式一采取了“熟练、大胆”（Lin 41）的改编模式，打开王宝川的世界，建构连接舞台上下、沟通中外的第三空间，探索出一条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并从中国文化角度思索“人性的真实”的跨文化对话路径。拉塞尔斯·艾伯克龙比（Lascelles Abercrombie）在 1935 年英文版《王宝川》的序言中提出了极具学术价值的洞见：“熊先生笔下的这个世界，这

个以‘宝川’为名的年轻女子所身处世界，是一个精致、得体的真实存在，它所彰显的，是一种深刻的人性真实”（转引自 Hsiung, *Lady Precious Stream* ix）。正是基于对“人性的真实”这一伦理理念的价值共鸣，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才得以实现。

王宝川的出走叙事，是一场以伦理选择为核心、以共识构建为目标的多元对话。熊式一借王宝川的出走，以个体命运为镜，映照出人类共通的伦理诉求，与观众共同探讨“人性的真实”这一文学与哲学的核心命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全球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物质文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却仍面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地缘冲突阴云不散、阶级分化矛盾加剧等全球性困境。这些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迫切呼唤以“整体善”为核心的正义伦理登场。王宝川在中国玩偶之家中遭遇的生存困境，是熊式一剖析全球非正义问题根源的重要切入点。他洞察到，无论是个体的生存挣扎，还是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冲突，均指向同一根源：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王宝川自幼受父权制度桎梏，个人意志、自主选择与人格尊严，始终让位于父权权威与家族利益。基于对这种不平等秩序的深刻体认，王宝川的出走被赋予了深刻的伦理内涵。通过王宝川的身体在相府、寒窑、行宫等多重场域的流动，她得以在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碰撞、对话与交互中，持续重构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王宝川出走所蕴含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容纳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的“全球性与民族文化的非同时性错位”（228）。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语境下，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节奏、实践路径与文化语境存在显著差异，这种非同时性错位极易引发文化误解与价值冲突。而王宝川的出走叙事，凭借独特的伦理包容性，为调和这一文化错位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路径。它摒弃文化对立的思维定式，不再执着于文化间的本质性差异，转而以身体流动与身份转换为载体，建构出一个动态、多元且富含混杂性（hybridity）的“第三空间”。霍米·巴巴明确界定，“第三空间”并非两种文化本源的机械叠加，而是在相互碰撞、伦理对话与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生成的全新文化形态，独立于原有文化体系，即“混杂性不在于追溯两种本源，而是生成第三种”（228）。在这一空间内，文化的固有边界被打破，身份的刻板标签被消解，不同文化元素在伦理意识的指引下自由交流、融合与重构，为跨文化多元协商搭建了核心场域。

观众通过出走的开放性讲述框架，接受熊式一的邀请，一起进入叙事创造的第三空间，参与王宝川对不平等秩序的主动抗争：从相府和寒窑出走，是对父权禁锢和阶级固化的突破；从东方刻板印象和西方普世宣传中出走，是对文化霸权的突围。熊式一并未将王宝川塑造成迎合西方想象的觉醒女性，而是借其故事彰显中国文化独有的伦理智慧与现代转型路径的可行性。王宝川的出走，既区别于西方个体主义的激进式反抗，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被动顺从，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的智慧选择。她的反抗，不

以彻底颠覆既有秩序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在秩序框架内寻求契合人性尊严的平衡；她的追求，并非对西方价值的盲目追随，而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中“仁爱”“平等”等核心观念的现代性诠释。王宝川所追求的平等，是根植于伦理意识与跨文化对话的平等：它承认并尊重文化、身份与价值的多元差异，并且在差异共存的前提下，通过平等对话、伦理协商实现权力平衡与利益共生。在与薛平贵的关系建构中，这一平等理念得以具象体现：王宝川不再是依附于夫君的附属者，而是拥有对等话语权的协商主体，能够与夫君共同决策、共担责任，携手面对命运的挑战。她所追寻的自由，是伦理框架下的责任自由，而非脱离社会伦理约束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以人性尊严为底线、以伦理责任为根基，是个体自主选择人生道路、掌控自身命运的正当权利。王宝川脱下华服、走出相府，是对父权束缚的主动挣脱，却并未抛弃家庭与社会的伦理责任。相反，她以更为独立的人格姿态重新定义了自身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可见，王宝川的出走叙事非但没有再生产西方的文化刻板印象，而是在对话中重构了中国文化独立的现代性话语体系，进而彰显中国女性的觉醒所特有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内涵。这种追求平等与自由的觉醒展现了人类共同的伦理需求，它不仅是一种包容、理性的现代性实践，促进传统与现代的共生、本土与世界的交融；也是联结不同文明的精神纽带，展现各文明独有的伦理智慧丰富全球伦理话语体系的可能性。

王宝川的出走叙事，以独特的流动性与开放性生成混杂性，构建了一个充满可能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文化得以平等对话，不同身份得以自由重构，不同价值得以相互融合。它向我们证明，跨文化交流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或同化，而是在多元协商中，共同创造一种全新的、更加包容的文化形态。王宝川所追求的平等自由，正是这种文化形态的核心价值所在，它为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生与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参照。王宝川的出走直面“人类未来何向”的时代问询，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第三空间”的协商中形成关照世界的“整体善”。这种共善作为关键线索，与戏剧跨文化交流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刘茂生，“文明交流互鉴与百年中外戏剧交流史研究”79）同频共振。王宝川的平等自由，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性中个体独立、权利平等的核心内涵，又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责任、和谐共生的智慧精髓，实现了跨文化语境下伦理意识与现代价值的深度融合。人类社会的跨文化对话，本质上是以伦理共识为精神纽带的文明对话，唯有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文明的互鉴与共生。

熊式一以戏剧叙事为载体，让王宝川从中国的玩偶之家主动突围，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张力中，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质的跨文化实践路径，有力驳斥了自我东方化的片面质疑，彰显了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的主体

性价值。王宝川的出走串联相府、寒窑、行宫等多重空间，完成其伦理身份从父权从属者到协商主体的蜕变，承载了内涵深刻的伦理协商，既揭示了等级秩序下的人类普遍困境，也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为化解文化与伦理冲突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剧作破除复古迷思与崇洋偏见，在批判中完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王宝川的出走所打开的“第三空间”，既回应了人类对“自由平等”的普遍伦理诉求，也以“协同共生”“仁爱向善”的中国智慧，为构建全球伦理共识提供了东方视角。归根结底，王宝川的出走既是个体伦理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向世界发出伦理协商邀约的跨文化实验。《王宝川》中伦理协商与跨文化对话的深层内涵，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人类共同价值重建，提供了兼具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与永恒价值。可以说，王宝川的出走为中国戏剧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叙事路径。

Work Cited

- Anon. "Kingsway Theatre." *The Times* 9 Dec. 1939: 4.
- . "Open-Air Theatre." *The Times* 20 June 1944: 2.
- . "A Place in History." *The Times* 24 June 1944: 5.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Dirlik, Arif. *The Postcolonial Aura*, translated by Wang Ning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 傅修延：“人类是叙事人吗？——何谓叙事、叙事何为和叙事学向何处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23）：86-101。
- [Fu Xiuyan. "Are Humans the 'Homo Narrators'? A Study of What Narrative is, What Narrative does and Where Narratology Goe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 (2023): 86-101.]
- 洪深：《洪深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 [Hong She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ong Shen* Vol. 4.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1959.]
- 熊式一：《八十回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年。
- [Hsiung, Shih-I. *My Recollections at the Age of Eighty*. Beijing: Dolphin Press, 2010.]
- ：《王宝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 [—, *Lady Precious Strea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 . *Lady Precious Stream*. London: Methuen, 1935.
- . *Lady Precious Stream: Acting Edition*. London: Methuen, 1936.
- . "Never heard of a Mandarin." *Oxford Mail* 17 June 1935: 5.
- 黄炜星：“古典赋技、文化挪用与身份探寻：从熊式一的《王宝川》述说跨文化交流”，《广西社会科学》12（2021）：181-186。

[Huang Weixing. "Classical Rhetoric,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Identity Exploration: Discuss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Xiong Shiyi's *Lady Precious Stream*."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12 (2021): 181-186.]

Lin Yutang. "Book Reviews: *Lady Precious Stream*." *T'ien Hsia Monthly* 1 (1935): 106-110.

刘茂生: "文明交流互鉴与百年中外戏剧交流史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5 (2024): 71-81。

[Liu Maosheng.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Drama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24): 71-81.]

——: 《英国戏剧的伦理叙事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5 年。

[—: *A Study on Ethical Narrative of British Dram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5.]

鲁迅: 《鲁迅文集·杂文集》(上)。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Lu Xu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 Essays* Vol.1. Wuhan: Huazhong U of Technology & Science P, 2014.]

倪婷婷: "多元语境下的中国性呈现——以熊式一的英语创作及其争议为考察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2020): 96-104。

[Ni Tingting. "Presenting Chineseness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s, with a Focus on Xiong Shiy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Controversy It Has Incurred."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2020): 96-104.]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王松林: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Phelan, James. *Somebody Telling Somebody Else: A Rhetorical Poetics of Narrativ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17.

Skinner, Richard Dana. "The Art of Mei Lan-fang." *Commonweal* 19 March 1930: 562.

Thorpe, Ashley. "After Thought: Archiving Absence through a Practice as Research Production of Xiong Shiyi's *Lady Precious Stream*." *TDR: The Drama Review* 63 (2019): 83-99.

——. *Performing China on the London Sta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王瑶卿: 《红鬃烈马》。北京: 中国戏曲出版社, 2000 年。

[Wang Yaoqing. *Hong Zong Lie Ma*. Beijing: China Opera Press, 2000.]

张婷婷、徐玮: "重塑东方: 熊式一'文化抗战'的跨文化实践", 《艺术百家》4 (2025): 55-63。

[Zhang Tingting and Xu Wei. "Reshaping the East: A Cross-Cultural Practice of Xiong Shiyi's Cultural Resistance."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4 (2025): 55-63.]